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与中国经济

主编\夏声川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与中国经济

主 编 夏声川
副主编 高佩荪 周泽红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阐述了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所包含的各方面主要内容,着重阐述了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指导作用,并从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的有机结合上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有助于读者既系统地掌握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又能系统地掌握当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理论。

本书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著作,可作为政府公务员及企业管理人员学习和研究之用,同时也适宜作为高等院校、网络学院、成人教育学院本科教育的教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经济/夏声川
主编.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ISBN 7-313-04276-0

I. 邓… II. 夏… III. ① 邓小平理论-理论研究 ② “三个代表”思想-理论研究 ③ 经济-研究-中国 IV. ① A849 ② D261 ③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9277 号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与中国经济

夏声川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张天蔚

立信会计出版社常熟市印刷联营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90 千字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50

ISBN 7-313-04276-0/A·009 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
第一节 时代主题的新判断	(1)
第二节 努力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7)
第三节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5)
第二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理论	(26)
第一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6)
第二节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科学发展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8)
第三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51)
第三章 社会主义本质与与根本任务	(57)
第一节 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基本理论问题	(57)
第二节 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科学内涵	(64)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71)
第四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党的基本路线	(81)
第一节 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81)
第二节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93)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98)

第五章 改革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动力	(105)
第一节 改革是我国的一场革命	(105)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与改革的判断标准 ...	(112)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117)
第六章 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调整与完善	(130)
第一节 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130)
第二节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调整与 完善	(140)
第三节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	(144)
第七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160)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及其 发展	(160)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	(166)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176)
第八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与产权制度	(188)
第一节 企业与企业制度	(188)
第二节 产权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	(195)
第三节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与方向	(212)
第九章 中国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关系	(221)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按劳分配为主体” ...	(221)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按生产要素分配	(228)
第三节 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和 政策协调	(241)

第十章 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253)
第一节 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职能	(253)
第二节 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手段	(263)
第三节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275)
第十一章 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285)
第一节 经济发展理论	(285)
第二节 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96)
第三节 科学发展观	(306)
第十二章 中国对外开放与对外经济关系	(319)
第一节 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与战略	(319)
第二节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演进	(332)
第三节 对外经济关系的内容与形式	(337)
第四节 加入 WTO,中国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 新阶段	(341)

第一章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节 时代主题的新判断

一、对时代主题的重新认识

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的产生和存在都有其形成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国,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邓小平从时代的大视角出发,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变化中的世界,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把握时代主题的转换,是制定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的基本依据,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正是由于时代主题的转换,才有了我国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的转轨。

整个 20 世纪可以一分为二:前半个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后半个世纪则逐步转变成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年代。

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威胁,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把备战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首要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增强国家的国防实力。建国以后,我们在对怎样搞

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以及制定相关的内政外交方针时,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建国初期,我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外条件都相当严峻。当时的世界处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全面的封锁和威胁,我们不得不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来对付敌视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但当历史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之后,我们对时代的认识并没有随之转变,思维仍然停留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观念框架中。伴随着“左”的干扰,我们一味强调世界大战爆发的紧迫性和国家政权被颠覆的危险性,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对外反侵略,对内反复辟。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更为严重,把局部战争的威胁看作是全面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的逼近,于是战备压倒一切,时刻准备打仗,而且立足于世界大战的早打和大打。为此而制定的国内国际战略,使我们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由此可以看出,正确认识时代,不但对于革命,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相当重要的。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的一些重要的和主要的方面发生了变化,战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二战前的大动乱进入相对稳定和发展的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不具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客观形势;殖民地体系瓦解了,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相继获得政治独立,迫切要求发展民族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得到加强,它们之间争夺世界或地区霸权以及争夺世界市场、势力范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保持在可以控制的限度内,它们之间再也没有发生战争等;美苏争霸世界,虽然各自拥有强大的核武器,但谁也不敢首先使用这一核力量,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的策略已走入“死胡同”,从而使“战争与革命”不再成为世界的主题。与此同时,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核战争灾难、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人民最为关心的、关系到人类社会生存和未来发展的两大根本性问

题。

尽管世界和平问题没有解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战争仍时有发生,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世界趋向于缓和,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邓小平指出:1978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

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站在时代的高峰,对当今的时代主题做了精辟的概括。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邓小平作过多次论述。早在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看法,不仅需要胆略,更要有高瞻远瞩的科学预见。两年之后,1980年1月,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搞得好的话,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一九七四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专门就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

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接着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避免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一是美苏两霸军事上势均力敌,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二是两霸的全球战略受阻,不敢轻举妄动。三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占世界人口 3/4 的广大的第三世界,也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和苏美两国人民在内,都是反对战争的。四是世界新科技革命引起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军事手段的作用相对下降,核讹诈、核威慑不再是制胜法宝。根据以上分析,邓小平认为: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在这以后,他在许多场合多次重申了这样的观点。

邓小平的这个正确判断,是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依据之一。他说:“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但是我们搞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

另一大问题是发展问题。邓小平把发展问题与和平问题并列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而且对发展问题更为关注,认为它是核心问题。从 1984 年起,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问题,对发展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解决发展问题的途径作了全面论述。1984 年 5 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时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

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同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南方要改变贫困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明确指出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和平是当今世界的基本态势和发展趋势。和平是指整个世界的和平,不打世界大战,是指在较长时期内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发生。从当前来看,冷战结束后,虽然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制约战争的因素进一步增长,世界和平更加有保障,但天下并未就此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世界人民争取和维护和平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维护世界和平仍需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第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发展是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关系问题,涉及整个世界发展和繁荣的问题。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更加专注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但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依然严重,并有日益加剧的态势。发展问题和和平问题一样,最终解决还存在诸多困难,同样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

和平与发展互为条件,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发展需要和平环境、和平离不开发展,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首先,和平是发展的基本前提。因为发展必须有和平环境,各类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的艰巨任务,没有和平作为前提是无法完成的。其次,各国的共同发展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因为发展可以密切各国间的联系,缩小各国经济差距,削弱超级大国的垄断地位,制约超级大国争夺霸权和世界战争的爆发。相反,贫穷落后往往引起社会动荡,成为诱发战争的因素。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强大,是世界和平的根本保证。

在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中,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首先,东西矛盾缓和之后,南北矛盾日益突出起来。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世界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趋势在加大,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因此,发展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发展中国家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超过 30 亿,占世界人口的 3/4,占世界土地面积的 3/5,但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却只有 1/50,不解决发展问题,“南方”国家和人民就无法摆脱贫困,更谈不上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现代化。其次,没有“南方”国家的发展,就没有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是世界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世界是个整体,地球只有一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不能建立在少数国家暴富,多数国家贫困的基础之上。因此,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关系到全人类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再次,既然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发达国家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并不是要富国向穷国发“慈悲”,而是穷国的发展关系到富国的利益所在,关系到富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当今世界,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和一体化,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各国经济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再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决不会有出路。最后,发展问题既是经济问题,

也是政治问题。一方面,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发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最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这个问题不解决,世界终究不得太平。南北的矛盾,根源于经济问题;地区间的冲突,都直接或间接与经济利益有关。因此,以发展促和平,在和平中求发展,当代世界的这两大主题是不可分割的。

综上所述,世界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两极格局解体之后,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多极化的趋势在发展。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呼声日益高涨。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和平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第二节 努力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一、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

新中国建立以后,怎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的课题。在早期的社会主义探索中,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基本参照了苏联模式。我们建立的经济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没有跳出苏联模式的框架。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特点: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上述两者

相对应建立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苏联模式粗放式发展的潜力逐渐耗尽,整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这种体制是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的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成功地改革这个体制,因而也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局面。而此时,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在世界技术迅猛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的经济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苏联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已完全处于劣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是错误路线指导所致,但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是苏联模式衰败促发的一场危机。

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模式的弊端显现后,中国共产党以苏联的教训为鉴,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论著,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可惜,由于当时对改革必要性认识不足,这些有益的探索未能坚持下去。相反,由于缺乏经验和急于求成,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生产关系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限制和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分配上大搞平均主义,在经济建设中违背客观规律。1966年又错误发动了文化

大革命。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

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作出了深刻的分析：“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给中国社会主义带来了深重灾难。正是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左”倾错误的危害和我们体制的弊端，从而促使我们党认真总结教训，推动了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形成。1986年9月，邓小平在同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同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可以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后来，邓小平还在多次讲话中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同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之间的关系。“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

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挫折都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准备。一方面,1956年后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创造和积累的一切积极理论成果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源泉;另一方面,这近20年探索中的错误所提供的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机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条件和重要契机。

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已经历了20多年的持续繁荣发展,相继进入现代化的高级阶段。在我们周边,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已崛起,成为令人瞩目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中已明显处于劣势,长期被社会主义国家搬用的苏联模式的弊端已暴露无遗。

苏联模式是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形成的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当时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它又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战争威胁之中,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这种模式发挥过重大的历史作用。它集中了当时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科技力量,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并依靠强有力的工业基础,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保卫了社会主义制度,也显著地改善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但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有明显的备战型或准战时型特点。具体地说:在发展战略方面,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忽视经济效益;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片面追求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以实现自给自足为重要目标,具有封闭和半封闭的特点。在经济体制方面,具有所有制过分单一、忽视市场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特点。

在政治体制方面,也具有官僚机构庞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和高度集中的特点。

随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逐渐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与备战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和体制的作用开始弱化;粗放发展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体制的潜力也逐渐耗尽;新技术革命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新技术革命使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从而进一步暴露了这个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在严峻的挑战面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没有作出有力的调整和改革,从而导致苏联和东欧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军事竞争中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苏联模式的僵化和普遍化,已经阻碍了人民群众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终于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苏联和东欧剧变的直接导火线是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路线造成的政治动乱,外部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而内部原因则是苏联和东欧各国没有及时地、成功地对苏联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在苏联模式衰败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邓小平理论就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发展。既有巨大的成功和经验,也有严重的挫折和教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十分深刻、非常丰富。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果断地纠正过去的错误;同时又坚决维护和继承已经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回到了正确的轨道。